

他有着清风明月般的心怀

——读《孙犁书札——致姜德明》

◎ 路来森

喜欢读作家的书札，闲言碎语，大事小事，娓娓道来，几欲能窥见其人写信时的情状和心态，有一种倾心相谈的亲切感，更彰显着作家的一份真性情。

《孙犁书札——致姜德明》，2013年5月，由“百花文艺出版社”出版。大开本印刷，封面装潢，一派素雅。全书收录孙犁致姜德明的书札111件。书札，始于1980年10月，止于1995年7月。书中，又附印了孙犁书信的影印件，孙犁书法的潇洒澹逸之美，流溢纸面，更增加了《书札》一书的美感和鉴赏价值。“百余封中，只有四十余件用常规的信笺，六十多件用明信片，二十多件用的是空白小纸条。”这样的信札，可谓“特别”，而这种“特别”，不仅让人们看到了孙犁先生用纸的节俭，更让人们认识到，孙犁的随性随性的真诚，是一个“非常淳朴而富有情趣的人”。

孙犁与姜德明通信期间，姜德明先后任《人民日报》的文艺部编辑，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等，文人交往，书信内容，亦多涉文事，诸如，编书办刊、约稿撰

稿、购书赠书、为人题写书名及撰写序文、读书体会、书艺切磋等等。但其内容，却又不仅仅局限于此，阅读《书札》，我们会看到孙犁先生，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更丰富的内容。

生活中的孙犁，内向而寡言，不喜欢参加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会议，也不喜欢文人聚会，一向主张“作家宜散不宜聚”，蜗居斗室，极力想寻找一种现实和精神的宁静，以便于更好地读书和写作。除了读书和写作，他也养养花，一棵白菜疙瘩花，就让他高兴得不得了；他甚至喜欢养蝈蝈，而且养出了经验：“今年，我才知道这玩意儿（蝈蝈）好吃大米，过去我喂它丝瓜花、菜叶，因有污染，常常死去。大米饭则既方便又安全，特为同好介绍之。”对于地方小吃，孙

犁也津津乐道，只是感叹一些地方小吃，名不副实了，“今日之地方特产，风味小吃，实已只有其名，而无其实”方方面面，倒也着实彰显了孙犁的“淳朴和情趣”。

孙犁，对于自己的文章，是特别认真的。外界传言，孙犁的文章是不允许编辑删改一字的，其实，大谬不然。1981年7月8日、12日、16日，在三次给姜德明的信中，都谈到一篇“附记”的发表问题，分别陈述道：“我写的那篇附记，如可用，请删去最后两句。”“考虑到一些问题，我写的那‘附记’，请不要用了”“‘附记’删去最后两句，可发”三次叮嘱，斟酌再三，足见对发表文章态度之认真。对于编辑和读者，他更是抱着一种谦虚和负责的态度，文章若被修改或删节了，如果合情合理，他

总会欣然接受，1981年10月14日，在给姜德明的信中，关于文章的删节，他就说道：“序文见报如此之快，甚为铭感。所作删节亦为妥当。那一段原是我后来补写的，有无均无关也。”1983年9月29日，在给姜德明的信札中，关于另一篇文章的发表，他又写道：“稿中如有不妥之处，径自改正即可，不必客气。”这，才是真正的孙犁，谦虚而负责的孙犁。

孙犁虽深居简出，但也并非对文坛、世事漠不关心；恰恰相反，他常常以一颗耿介无私之心，痛斥那些文坛不良现象。1981年12月18日给姜德明的信札中，他写道：“我对任何作者，无个人恩怨，但颇看不惯一些人的做法，他们把文坛弄成了官场、交易所、杂巴地，卑鄙浮浅，使人气恼。”对

于出版界，某些时期的不良倾向，他也坦然道：“近出版界竟相出通俗读物及白话译古典书，是文化逐渐下降的反映。”文化的研究，会因时代的发展而发展，而变化，但其发展方向如何？孙犁拭目以待，“文化界确有一些反常现象，除去周氏，如罗振玉、郑孝胥等，都受青睐。甚至有人拟建立租界博物馆。据说租界‘孕育’出了一种文化。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化，又如何孕育出来，只有等博物馆建立起来，才知分晓。”

可见，读书作文的孙犁，并非一腐儒，他不仅有自己独特的学术见解，更能窥见时代发展的痕迹。他有着清风明月般的心怀，有着锷介耿直的性格，有着登高望远的远见和卓识，他是一位好作家，一位让人敬重的文化大家。

朗达·拜恩的《秘密》

◎ 叶雷

《秘密》一书是著名励志作家朗达·拜恩“吸引力法则”三部曲的巅峰之作！《秘密》一书出版后，立即风靡了整个

世界，目前已被译成47种语言，发行量超过2000万本，被《今日美国》评为过去15年最畅销的20本书之一。生命的个体是通过进行思考来作用于外部世界的，显意识和潜意识是思考行为的两种模式。显意识是推理的意志，潜意识是由以往意志推理的结果累积而产生的本能的欲望。显意识识别检查并影响着潜意识的活动，潜意识控制、引导和警示着我们的显意识。研究发现，潜意识占据了我们的90%以上的精神生活储备。在内心不断地暗示自己，强调自己想要的结果，将显意识潜意识化，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不再依赖显意识的活动，也就是潜意识自觉化的程度，就直接决定着

我们悠闲从容理想状态的程度，或者叫“心想事成”的程度。拜恩在《秘密》中将其“发扬光大”，“要改变我们的处境，须先改变我们的思想”。另一方面，拜恩又将其神化，赋予意念、思想以“能量”的概念，还加以灵修的玄乎，甚至扩大到整个宇宙，同时，将柏拉图、伽利略、贝多芬、爱迪生、卡耐基、爱因斯坦等许多非凡人物的成功，硬贴上了运用这个“秘密”的标签。拜恩在《秘密》一书中同样给出了“秘密”的运用和强效的方法，第一步“要求”，弄清楚“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”；第二步“相信”，要想“一定会实现”，不要想“会不会实现”；第三步“接收”，用“我现在已经拥有它了”去激励自己。这大概是有益的。我们绝大多数人，想要的往往得不到，不想要的却往往不请自来，实际上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吸引力法则，没有察觉到我们聚焦的过程，而流失了把握自己的机会。

王安忆笔下的异域风情

◎ 中梅

《波特哈根海岸》以旅行为契机，记录了王安忆20多年前，数次旅德期间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感。从海德堡到吕贝克，从柏林到斯特拉伦，足迹遍布德国的大小城市。这是一次灵魂的出游，空气中都是异国海风的味道，陌生而令人忐忑。“在那阴晴无定的北方，波罗的海海底有多少艘沉船，风暴击碎多少强悍与衰弱的生命，生与死的课题成了每

日都可遇到的平常的事情。在那教堂与修道院下，一块块的石碑连成的殿堂的漠漠大地。观光者轻佻的脚步，从那悠远的生日与卒日上查查而过。”王安忆内心怀着对家乡与日俱增的思恋，用疏离的眼睛，观察着这个全然陌生的国度，是异乡那些奇特友好的人们，带她经历了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，因而衍生出一段独特难忘的回忆。

山本文绪近作

◎ 小林

泣》，山本自称是她作品中“最阳光”的励志之作，书中分别描绘从事花艺设计师、体育老师、银行职员、漫画家等工作的女性，在轻盈的文字中，她们的职场人生却流露出几许无奈，然而到最后，主角又总能给自己精神喊话般的奋发期许，迎来一点希望的力量。

《世上所有的女人都结婚了？》是继《然后，我就一个人了》，畅谈关于结婚的种种：就算没结成婚，也要昂首挺胸活下去，因为能拯救你的人，只有你自己；在结婚一事上不要钻牛角尖，更不要放弃希望，懂得柔和地去实现愿望的乐趣。

《鼠疫》：永恒的惩罚

◎ 河西

是“背负地狱却在天堂里行走。”

它表明，加缪在这一切不幸事件的中心，在死亡、隔离、刑罚、苦役的“富庶的根基”上，时刻实践着神的律令。鼠疫的降临可以看作是加缪代替上帝对他的臣民实施的一次“西绪福斯式体罚”。在叙事上，作者之所以不动声色，是因为这些充斥于人类的苦难与罪恶正是他规划的使命所在。加缪晚年的信教和《西绪福斯的神话》末尾对“西绪福斯是幸福的”的断言在他的心中升起一种谦卑的热情：去陈述这受罚的全过程，而这受罚却没有

什么特异之处，它只是人类存在所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则而已。人与命运之神的推拒战在加缪的笔下被刻意地平淡化了，在鼠疫面前，与其说是里厄医生的妙手回春拯救了这座城市，不如说是鼠疫自身暂时的退却给了他们以喘息之机。在小说的结尾，加缪以无情的口吻宣告了鼠疫如巨石般的循环性：“也许有朝一日，人们又遭厄运，或是再来一次教训，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，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。”加缪消解了存在的苦难之维，他所称许的荒诞非理性其实是在

证明神学伦理学——一种理性之外的道德法规的合法性。苏珊·桑塔格把加缪的神意言说归结为一种“丈夫气质”，这是她注意到了加缪冷漠表层之下强烈的道德规训意图，桑塔格说这是“道德之美”。在道德层面上，丈夫也远比情人接近于《圣经》的教诲。加缪试图在读者的心里激起层层感情的涟漪，但不是去赞颂那位西绪福斯式的悲剧英雄里厄医生，而是对上帝的惩罚的感激之情。

同时应该看到，石头在加缪的文学体系中从来不是一种静止之物。在《西绪福斯的神话》中，巨石仿佛荷马笔下的游动悬崖，它是附着在西绪福斯精神中的一个幽灵，一种不可治愈的顽症。而鼠疫则和石头一样像是一堵从四面八方向你围拢来的墙，使你无从躲避，将 you 与外界彻底隔离开来。鼠疫/巨石成了裹在金蝉蝉翼上的一层硬茧，一套紧身衣，它们的存在预示着金蝉脱壳俨然是个不切实际的梦，而肇始于这人间的一切荒诞之事仍将继续下去，不是简单的外科手术所能解决得了的。



新书推荐



《过得刚好》，郭德纲著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。书中的文字记录了郭德纲这些年的心路历程以及对人生、相声艺术、生活的感悟和思考，行文冷静，不煽情，不夸张，不做作，不隐瞒，不回避。嬉笑怒骂皆成文章，文字独特，语言幽默风趣，读之不禁令人捧腹，这份快乐和他的相声作品一样过瘾。



《乱》(美)伍迪·艾伦著，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。这是导演伍迪·艾伦2007年的最新诙谐作品集，也是他25年来出版的第4本文集，收录的18篇作品，大多数刊发在《纽约客》杂志。作为侧写描绘知识群体思想生活喜剧电影家，伍迪·艾伦的小品，对艺术、性、美食和犯罪等主题，进行了亦庄亦谐的特殊表达。